

商务新知译丛

希腊悲剧时代的 哲学

〔德〕尼采 / 著



商务印书馆

商务新知译丛



〔德〕尼采著 李超杰译

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

商务印书馆

2006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德]尼采著;李超杰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商务新知译丛)
ISBN 7-100-04961-X

I. 希… II. ①尼…②李… III. 古希腊罗马
哲学-研究 IV. ①B502.1 ②B516.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27627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商务新知译丛

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

[德]尼采 著

李超杰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ISBN 7-100-04961-X/B·686

2006年12月第1版

开本787×1092 1/32

2006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3%

定价:7.00元

Friedrich Nietzsche

**DIE PHILOSOPHIE IM TRAGISCHEN
ZEITALTER DER GRIECHEN**

Saemtliche Werke, Kritische Studienausgabe in 15 Einzelbaenden,

Band 1, 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de Gruyter, 1988

序(约写于1874年)

对于离我们较远的人们，我们只需了解他们的目的，便可以从整体上对他们加以褒贬。而对于离我们较近的人们，我们则根据他们用以实现自己目的的手段，对其做出评判：我们往往责难他们的目的，却因为他们实现自己意愿的手段或方式而喜欢他们。只有对于它们的创立者而言，哲学体系才是完全正确的。对于所有后来的哲学家来说，这些体系往往是一个巨大的错误，而在智力更为低下的人看来，则是真理和谬误的混合体。但归根结底，这些体系是一个错误，因而，可以弃之不用。所以，很多人对所有哲学家进行非难，因为哲学家的目的不同于他们自己的目的；哲学家是远离他们的人。与此相反，谁喜欢

伟人,谁也就会喜欢这些体系。就算它们也是完全错误的,但它们毕竟有确定无疑之处,有一种个人的情调和色彩。人们可以利用这种情调和色彩获得哲学家的肖像,正如人们可以从一个地方的植物推断出其土壤状况一样。总而言之,这种生活方式,这种看待人事的方式曾经存在过,因而是可能的:“体系”就是这块土壤上的植物,或者至少该体系的一部分是如此。

我要简要地讲述那些哲学家的历史:我会仅仅从每一个体系中抽出这样一点,它构成历史必须加以保护的“个性”的一部分,并且属于不可反驳、不可争辩之列。这是一个开端,旨在通过比较重获和重塑那些天性,使希腊天性的复调音乐有一天能再度响起。它的任务在于阐明我们必须始终加以“珍爱”和“崇敬”的东西,这也是任何后来的知识都不能从我们心中夺走的东西:这就是伟人。

这种讲述古希腊哲学家历史的尝试，因其篇幅短小而有别于类似的尝试。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这里所谈到的只是每个哲学家的很少一部分学说，就是说，它是有所取舍的。但是，选出的这些学说，却能最鲜明地体现一个哲学家的个性。相比之下，如果像平常的手册所惯用的那样，悉数列举流传下来的一切可能的原理，则必然会使一个哲学家的个性归于沉寂。这样的叙述会变得极为乏味：因为正是那些个性的东西才使我们对那些被驳倒的体系感兴趣，也只有这样的东西永远不能被驳倒。通过三件轶事，便可给出一个人的肖像。我试图从每个体系中抽出三件轶事，对于余下的，则只能忍痛割爱。

哲学不乏反对者。对于他们的反对之声，人们最好还是听一听，特别是当他们奉劝德国人的病态头脑拒斥形而上学，奉劝他们像歌德那样通过自然得以净化、像瓦格纳那样通过音乐得以康复的时候。民族的良医拒绝哲学。所以，谁想为哲学作辩护，谁就必须表明健康的民族为什么需要哲学并且已经运用了哲学。如果他能够表明这一点，也许病人自身会获得这样一种富有成效的见识：为什么恰恰对他们来说哲学是有害的。诚然，有很好的例证表明：即使全然没有哲学，或者只是有限地、几乎是儿戏般地运用哲学，健康也可以存在，全盛时期的罗马人就是这样在没有哲学的情况下生活的。但是，一个民族患

了病，而哲学使这个民族恢复了失去了健康，这样的例子到哪儿去找呢？如果说哲学曾经显露出帮助、拯救和辩解的功能，那么，这种情况也是出现在健康人身上，而对于病人来说，哲学则总是使其病得更重。如果一个民族已经涣散分化，与其成员处于一种松散的紧张关系之中，那么，哲学决不会使这些成员与整体重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如果一个人打算画地为牢，为自己筑起自给自足的篱笆，那么，哲学总是会使其愈加孤立，并通过孤立导致他的毁灭。如果不具有完全的合理性，哲学便是危险的：只有一个民族（但不是每一个民族）的健康，才会赋予哲学这种合理性。

现在，让我们看一看那个最有说服力的例证，从而了解在一个民族那里被称为健康的是什么。作为真正健康的人，希腊人以下述方式为哲学本身作了永久的“辩护”：他们做了哲学运思，而且比任何其他民族做得都多。他们未能适时终止这种运思，因为即使到了垂垂暮年，他们的行为举止仍然像是哲学的狂热追求者，尽管他们所理解的哲学仅仅成了关于基督教教条的虔诚的细节考证和神圣的无谓争辩。由于未能适时终止这种运思，他们便大大削弱了自己对

野蛮的后代的贡献，因为作为冥顽不化的青年人，这后代必然会纠缠于那人工编织的罗网之中。

相比之下，希腊人懂得适时开始，并且比任何其他民族更清楚地提出了这样一种理论，即人们必定在什么时候开始哲学运思。就是说，不像有些从痛苦中推演出哲学的人所臆想的那样，有愁苦才有哲学运思；相反，这种运思是从幸福中，从成熟的成年期，从骁勇善战的壮年的兴高采烈中开始的。希腊人在这样的时刻开始哲学运思，对我们了解希腊人本身，了解哲学是什么，哲学应当是什么有很多启发。如果那时的希腊人像当今有学问的庸人所设想的那样，是冷静早熟的实践家、乐天派，或者像没学问的空想家所幻想的那样，生活在感官的享乐之中，人们决不会在他们那里找到哲学的源头。他们充其量是一个顷刻流入沙滩或者蒸发为云雾的小溪，决不会是那翻腾着骄傲浪花的宽广的大河。我们所了解的希腊哲学就是这样一条大河。

虽然人们已经一再指出这样一点：希腊人可能从东方异邦发现和学到了多少东西，以及他们可能从那里接受了多少种东西，但是，如果

人们把来自东方的所谓老师和来自希腊的可能的学生放在一起，例如，把琐罗亚斯德^①和赫拉克利特放在一起，把印度人和爱利亚学派放在一起，把埃及人和恩培多克勒放在一起，甚至把阿那克萨哥拉和犹太人放在一起，把毕达哥拉斯和中国人放在一起，那无疑会出现一个非常壮观的场面。这样一个个地摆放，说明不了多少问题。但只要人们不要我们承受下述结论，上述全部思想则尚可忍受：希腊哲学只是舶来品，并不是在本土自然生长出来的；甚至作为异己之物，哲学与其说推动了希腊人的进步，不如说导致了希腊人的毁灭。没有比奢谈希腊人的本土文化更愚蠢的了。确切地说，他们吸收了其他民族的活生生的文化。唯有他们走得如此之远，原因在于他们懂得在其他民族止步的地方，继续前行。他们那富有成效的学习本领，令人敬佩。所以，我们应当和他们一样，向我们的邻邦学习，而且，是为了生活，不是为了增长知识；我们应当以学到的一切东西为支撑，从而比邻邦跳得更高。追问哲学的开端完全是无关紧要的，因

① 琐罗亚斯德(Zoroaster)，波斯预言家，拜火教的创始人。——译者

为无论何处，开始阶段都是粗糙的、未成形的、空洞的和丑陋的。任何事物都只有到较高阶段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谁要是因为埃及哲学和波斯哲学可能更为“源始”并且无疑更为古老，就致力于对它们的研究，从而忽略希腊哲学，那么，他的做法就和下面这些人同样轻率：他们不能心安理得地面对那么美好深奥的希腊神话，直到他们把这些神话追溯到其物理细节，追溯到太阳、闪电、雷雨和云雾，仿佛这样才算追溯到了神话的开端；例如，他们错误地认为，与希腊人的多神教相比，他们在虔诚的印欧语系的人对于一个苍穹的顶礼膜拜中重新发现了一种更纯净的宗教。通往开端的路毫无例外会通向野蛮。谁要致力于对希腊人的研究，谁就应当始终坚持这样一点：在任何时代，不受约束的求知欲本身和对知识的敌视一样，都会导致野蛮；希腊人通过对生命的关切，通过一种理想的生命需求，遏制了他们原本贪得无厌的求知欲，因为他们要马上体验他们所学到的东西。希腊人还是作为文化人并且带着文化目标从事哲学的，所以，他们没有出于任何一种夜郎自大的心态重新创造哲学和科学的各种元素，而是马上着手对这些接收的元素加以充实、加强、提高和提

炼,从而在一种更高的意义上、在一个更纯的领域内成为了创造者。就是说,他们创造了“典型的哲学家头脑”,整个后世再也没有创造出任何本质性的东西。

谈到由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阿那克萨哥拉、恩培多克勒、德谟克利特和苏格拉底这样的古希腊大师组成的惊人理想化的哲学家群体,任何一个民族都会感到惭愧。所有这些人都是一个整体,是用一块石头雕成的。在他们的思想和他们的性格之间,存在着严格的必然性。他们没有任何行为规范,因为那时还没有哲学家和学者身份。作为当时唯一以知识为生的个人,他们都生活在巨大的孤独之中。他们都具有先人的道德力,并且据此超过了所有后来者。他们用这种道德力去发现他们自己的形式,并通过变形使其日臻完善,达到至纯至大。因为没有任何模式可以帮助他们,从而减轻他们的困难。所以,他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叔本华所说的与学者共和国相对的天才共和国:一个巨人穿越空寂的时间间隔,向另一个巨人呼唤,任凭在他们脚下爬行的侏儒发出的恶作剧般的鼓噪,从容地继续着崇高的精神对话。

我所面临的任務，是就這種崇高的精神對話，講一講我們近代的重聽症或許可以聽到、可以理解的東西。毫無疑問，這樣的東西微乎其微。依我看，從泰勒斯到蘇格拉底這些古代哲人，在這種對話中談到了在我們看來構成典型的希臘精神的一切，儘管是以最一般的方式加以談論的。和他們的性格一樣，他們的對話也顯示了希臘天才的大致輪廓，而整部希臘史就是這個輪廓的模糊的翻版，是其朦朧的因而是不清的摹本。如果我們對希臘民族的全部生活做出正確的解釋，我們所看到的將始終是反復出現的同一幅肖像，這就是從其最高的天才身上發出的絢麗色彩。同樣，希臘土地上最初的哲學體驗，即對“七賢”的認可，是希臘人肖像上一個清晰可見、令人難忘的線條。其他民族出聖徒，希臘人則出賢哲。人們正確地指出，一個民族的性格，與其說表現在這個民族的偉人身上，不如說表現在這個民族認定和尊崇這些偉人的方式上。在其他的時代，哲學家是最敵對環境中的一個偶然的、孤獨的漫遊者，不是悄無聲息地潛行，就是握緊拳頭去掙扎。只有在希臘人那里，哲學家才不是偶然的。當他面對世俗化的巨大危險和誘惑，於公元前第六、第五世紀出現的時

候，当他仿佛从特罗弗纽斯洞穴走向希腊殖民地的奢华、贪婪、财富和肉欲的时候，我们可以猜想，他是作为一个高贵的警告者出现的，其目的与在那些世纪悲剧为之诞生的目的是一样的，神秘秘仪在其所用的奇形怪状的象形文字中加以表现的，也是同样的目的。一般说来，这些哲学家对生命和生存所作的判断，在内涵上比一个现代判断丰富得多，因为他们所面对的是一个丰富完满的生命；因为和我们有所不同，在他们那里，思想家的情感还没有被下述冲突搞得无所适从：一方面是对生命的自由、美和伟大的渴望，一方面是对真理的追求，而这种真理仅仅追问：生命的价值到底何在？所以，关于哲学家在一个现实的、具有统一风格的文化中所要完成的任务，我们没有资格从我们的状况和体验中加以猜度，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文化。相反，只有一种像希腊文化那样的文化，才能回答这个关于哲学家任务的问题，如我所说，只有这样的文化才能从总体上为哲学进行辩护，因为只有这样的文化才能知道并且证明：哲学家为什么以及如何“不”是一个偶然随意的、居无定所的漫游者。有一种铁一样的必然性，把哲学家与一种真正的文化联系在一起。但是，如果没有

这样的文化，情形会如何呢？此时的哲学家就成了一颗难以捉摸、从而令人惊恐的彗星。如果运气好的话，他也会作为文化太阳系中的一颗主星而发光。所以，希腊人为哲学家作了辩护，因为只有在那里他才不是一颗彗星。

在做了这番考察之后，如果我把柏拉图以前的哲学家作为一个密切相关的群体加以讨论，并且打算在这本著作中专就这些哲学家进行论述，应当很容易被人们所接受。柏拉图开始了某种全新的东西。或者，我们可以同样正确地说，与从泰勒斯到苏格拉底的那个天才共和国相比，柏拉图以来的哲学家缺少了某种本质性的东西。谁要以忌妒之心表达他对那些古代大师的看法，他可以把他们称为片面的人，而把以柏拉图为制高点的他们的后继者称为多面的人。把后者理解为哲学的混合性格，而把前者理解为纯粹类型，也许更加准确和公正。柏拉图本人是第一个杰出的混合性格，无论是在他的哲学中，还是在